

# 永远的“红头巾”

——评《星岛女孩》

□汪修荣



星岛女孩

在我看来，一部优秀儿童文学作品，首先故事要吸引人；其次，文本内涵要丰富，读后能让人产生一种想倾诉、可谈论的欲望。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我想《星岛女孩》无疑是一部好作品。

故事是从20世纪30年代新加坡(即现在的新加坡)开始的。主人公米粒是个十岁的小“红头巾”。“红头巾”是人们对一群来自广东佛山三水、专门从事建筑苦力活的中国女性的称呼，因头上统一佩戴红色的头巾而得名。米粒的祖母和母亲在船上产下了米粒后就不幸落水而亡，小小的米粒从此便由同来的姐妹们共同抚养，吃百家饭，穿百家衣，她像一粒种子在南洋这个陌生的土地上顽强地生存下来，成了一个小“红头巾”，从小就从事着力所能及的劳动。一次，借着送珠花的机会，她偶然结识了植物园附近黑房子里的富家女孩艾丽娅，从此开始了两人之间奇特的友谊。所有的故事都围绕这两个儿童的交往展开，表现出儿童善良、美好、纯真、幻想

等天性，让我们感受到人性的善良与美好。

女性觉醒是这部小说另一个鲜明主题。虽然小说以新加坡为背景，但书中的女性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华人华侨。在作品中，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是一种普遍的群体意识和自觉。米粒从小渴望读书，追求独立；艾丽娅以乖戾的方式反抗父亲独裁，向往光明和外面的世界，“要做和别人不一样的人”；阔太太玉珠在女儿的影响和鼓励下，意识到“人心里都有一凤凰”，最终克服个性的软弱，勇敢反抗丈夫汉斯的霸道与禁锢，最后和女儿一起冲破封锁，争取人格独立与自由。作品中最突出的，自然是以姑姑、二娇、石头姨、阿奶等人为代表的女性群体争取独立自由的奋争，无论是阿奶当年为反抗包办婚姻与丈夫勇敢“私奔”，还是二娇解除童养媳契约，与苦力仔自由结合，抑或姑姑、石头姨、妈姐等人争取自由与独立的努力，无不反映出女性意识的觉醒与解放，“红头巾”不仅代表着中国女性“吃苦耐劳”的精神，更象征着她们对自由独立和

个人幸福的追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小说也是一首女性解放与自由之歌。

这部小说虽然以儿童视角审视20世纪30年代南洋新加坡的生活，却视野宏阔，通过作品中华人华侨与祖国、故乡的联系，通过浓厚的中华文化元素抒写出浓浓的爱国情怀。这种爱国情怀是通过多方面来体现的，牛车水、豆腐街等节日气氛和文化元素都起到了很好的渲染作用。无论街上的带有华人标志的商品，还是皮影戏、木偶、粤剧、服饰、中国红、放河灯、舞龙舞狮、中秋节等中华文化元素，都散发出中国文化的馨香，反映出中华儿女对故乡和祖国的思念之情。抗战爆发后，他们身在南洋，心系祖国，不分男女老少纷纷认购“买花捐”“报纸捐”“盖房子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二娇的丈夫还勇敢加入南洋机工队回国支援抗战，爱国之情成为全体华人血脉中最深厚的感情。爱国情怀是这部小说最鲜明的底色、最耀眼的中国红。

小说构思巧妙，许多矛盾设置

都充满戏剧性、故事性，比如米粒与艾丽娅从敌意到友好，艾丽娅与父亲的冲突与和解，玉珠对丈夫汉斯的忍让与最终反抗出走，二娇与苦力仔喜剧性的结合，妈姐从被辞退到坚决不回头，艾丽娅一家决定收养米粒，而米粒最后一刻却又毅然回到“红头巾”身边……各种人物矛盾与冲突使小说一波三折，增强了戏剧性和悬念。

这部作品时空交错，明暗虚实结合，历史与现实交汇，现实与想象(书中描绘的神话传说)交融，大大拓展了小说的疆域，张弛有度，跌宕起伏，虽然没有正面描写战争，但抗战氛围却跃然纸上，增加了小说的厚重感和历史深度，使其远超过一般儿童小说的范畴，显得丰厚而博大。

# 从故乡出发的写作

□范墩子



来。有时我会坐在石头上观察一下午的鸟群，有时我会躺在厚厚的莎草上睡一个下午，有时什么也不干，只是静静地走，静静地听。也就陆陆续续写了许多零碎的文字，这些文字，是我当时的感受，是我当时的所思。现在修订这篇后记时，我也是趴在老家的火炕上，窗外秋雨霖霖，雨水打在屋顶上，传来沉闷而又亲切的声响。

重读书稿，我倒觉得，它们都是我在这块土地上种下的一茬庄稼。读者朋友们，你们是否有耐心来收割它？

可以说，我的写作是从故乡开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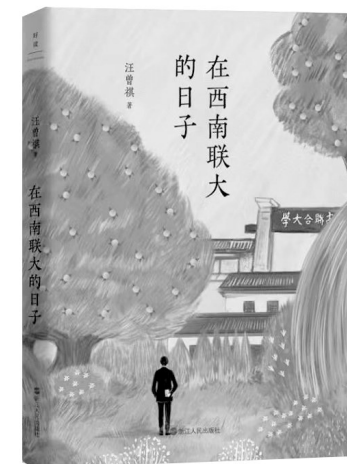
而立之年，我成了西安文学艺术创作研究室的一名专业作家，对我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以往写作，都是零敲碎打，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现在情况不同了，我该用更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勤勤恳恳地写，一心一意地写，用灵魂的冷光照亮夜晚的归途，把生命交给读者。三十岁前，写文章是一种心态，三十岁后，还能这样去写吗？或者说，还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

之所以看重这本书，不光因为它是我的首部散文集，更主要的是它收录了我前期的部分作品，一些曾大胆表述过的观点，今日读来竟产生了质疑：这是我写的作品吗？面对它们，我本该感到惭愧才是，但我想，毕竟当时写作的态度是诚恳的，于我而言，这已经够了。怀着这颗热诚的心，我写下了这篇后记，愿你能喜欢我的文字，能读到我滴在语言深处的泪水。(本文为范墩子散文集《也傍桑阴》后记)

# 读儒者文章 学学者精神

——读《在西南联大的日子》

□潘飞飞



精神震撼了。汪老带我认识了专注学术，有思想美、逻辑美、才华美的闻一多；有热情好客锲而不舍，教学风格独特的沈从文；有相貌奇古，学识渊博又无比绅士的吴雨僧；有关爱学生，课堂有趣有料的金岳霖；有说话不拘无束，潇洒自信的唐立厂；有胡子旺盛，老来依然声若洪钟的戴修瓚……这些人物的共同特点便是知识渊博，专业过硬，素养极高，他们的交友圈几乎都是重叠的，干净而又有追求，向上而又充满激情；他们除了有各自擅长的专业领域外，还拓展体育、艺术、逻辑思维等方面的学识，为人处世低调谦逊，毫无架子，没有华丽。他们是儒雅君子，是钢铁战士；他们各有千秋，倜傥不群；他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活着体现价值，死亡毫不畏惧；我在是彼此的福气，我不在你有美好的回忆，这就是西南联大人身上的精神。

了解西南联大的事，我被这所学校的成就所震撼。书中多次提到“西南联大是抗战时期，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在昆明组建的临时性大学。这是一座战时的、临时性的大学，但却是一个产生天才，影响深远，可以彪炳于世界大

学之林，与牛津、剑桥、哈佛、耶鲁平列而无愧色的辉煌的奇迹一样的，‘空前绝后’的大学。”“八年时间培养的人才比清华、北大、南开三十年的才多”。那里大师云集，有梅贻琦(清华校长)、蒋梦麟(北大校长)、张伯苓(南开校长)、钱锺书、闻一多、朱自清、金岳霖、林徽因、梁思成、陈寅恪、傅斯年等，半个文学圈的泰斗级人物都出自这所学校，让我充满敬意与崇拜。我也有好奇与疑惑，是什么原因让这所大学有如此成就？汪老的答案是：“自由。”他多次提到，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对学生的要求是不严格的，一般就期末交一篇读书报告，但是“西南联大许多教授对学生鉴别的标准：不怕新，不怕怪，而不尚平庸。不喜欢人云亦云，只抄书，无创见”。教育的包容与挑剔让这里的学子有更多的学术自由与思考空间，他们崇尚民主，善于思考，勇于创新，不甘落后。

他们住的房子是土墙草顶，一间宿舍住四十人，没有桌椅就用肥皂箱；吃的常是混有砂石、木屑、老鼠屎的“八宝饭”；日常生活还要时刻担心日军的轰炸，轰炸来时赶快跑警报。明明是异常贫苦

逃难的日子，却被汪曾祺谈家常的语言讲得轻松快乐，充满趣味。他们爱读书，在教室读，在图书馆读，在宿舍读，在茶馆读，在树林里读，在逃难路上读，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书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书可以”；他们爱交流，课堂上与教授进行思维的碰撞，课后在宿舍里与同学进行学术的探讨，就是去街上、茶馆也是带有一双智者的眼睛，儒者的耳朵……他们闹中取静，静中生慧；书中寻路，路中问心；难中寻趣，趣中求进；汪老把大火大难叙述得平实恳切，把琐事佳话讲得趣味横生，给坚韧与伟大留下无穷韵味，真理与智慧在这里起源，神奇与不朽在这里诞生。

再读昆明的事，我好像游览了整个昆明，昆明的美食，昆明的街道，昆明的习俗，昆明的人情，我都再了解了一遍，几年前去云南只知道洱海很美，丽江很浪漫，昆明街道宽又宽，登上玉龙雪山是好汉，下次再去云南，我一定专挑昆明，去看看西南联大的旧址，走走凤翥街、龙翔街，去坐坐昆明的茶馆，品尝昆明的菌子、米线饵块，去闻闻缅桂花的花香，带着这本《在西南联大的日子》，重走昆明。

# 漫谈《郑教授的生死恋》

□李同福

最近拜读齐效斌先生的小说大作《郑教授的生死恋》感触很深。作品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洋洋洒洒三十万字，内容以高校教授、学者为主体，探究学术问题深刻广博。笔者才疏学浅，难以深论，只能漫谈一些感觉。

《郑教授的生死恋》以古城大学、科技大学为背景展现了高教氛围的世面人生。其间塑造了唐可形、郑嘉欣、齐晓轩、梁栋、邹云鹏、郑向阳、齐埃科等人品清正，治学谨严的学者。文中既有张爱民书记、李向农副校长、周继超校长等正气凛然的高校领导，也有H书记、姜琪冰、姚碧云等逐利弄权者。可谓泾渭分流，泾流清澈。

小说开篇以郑嘉欣教授为重点，浓墨重彩刻画了这位古城大学著名的西方哲学家、哲学学院院长的心路历程。郑教授本姓冯，是早先过继给父亲冯志远的远房老表郑国栋的。当时冯家是大户，郑家是小门。郑教授并不以此为意，他谨遵父训，既忠诚温顺地做了郑家的后人，也念念不忘冯家的恩德。

郑教授有其纯正、仁爱之品

行，自然有其非常之致学作为。郑教授给恩师唐可形的学生孟浩然讲过一段感人肺腑的话：

多少年来，正是由于他们(唐可形和诸位同仁)的提携和支持，我的学术水平才有跨越式提升，科研成果才有较高质量的建树。当然这些成果的取得也离不开我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发展。我不止一次地讲过，我是一直在两种精神——一种是革命先烈的乐观主义精神，一种是在发愤著作的现实主义精神照耀下，由不自觉地自觉地上哲学研究这条不归路的。我的岳父和父亲是响当当的革命先烈，他们两个始终坚守信念，高扬革命必将胜利的乐观主义精神不断地激励着我；我的先祖又是司马迁。而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现实主义精神也常常鼓舞着我的我。所以我是幸运的。有时候我冒昧地自比父亲郑国栋、岳父陈吉言；有时候又自认为是当代的司马迁。也许有点不自量力。不过我的初衷是探究在哲学研究中，尤其在法国近代哲学研究中，对中国是否有现实意义。在真正了解了法国近代哲

学在中国哲学实行理论转换与发展的重要意义之后，这个问题是不言而喻的。法国近代哲学的研究仍然具有不可或缺的当代价值。关键在于在今后的研究中如何体现它的当代价值。即如何凸显理论研究中的中国语境，体现创新研究的中国气派。如果我能为此贡献自己的一切，也算我郑嘉欣为党为国尽忠了……

郑教授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醉心于西方哲学，醉心于康德，醉心于魏晋玄学。研究学问苦心孤诣，探赜索隐，整天伏在电脑前写作。他因疲劳过度住院，一个礼拜后，身体刚刚恢复，又苦熬在电脑上，格子纸上，谁劝也不听。他不仅在学术上孜孜矻矻地研究笔耕不辍，而且还在非学术活动中不断地付出精力。他经常参加学校内外学术沙龙讨论学术问题，力求辨明学术是非。他多次协助恩师唐可形办研讨会，帮唐可形教授整理会议论文集，几乎拼着命做事。由于超负荷运转，疲劳过度而元气大伤，并因此住进国务院西山疗养院休养。而他却说由于工程巨大，

几个弟子耗不起已经住进医院，如果自己敬而远之，这项工程就有可能搁浅，成百万的启动资金就会付诸东流。在他心力交瘁之时，还应中国古代理学理论年会的组织者——华东师范大学的邀请，戮力参加了由上海市宣传部长王元华教授倡议的中西文论比较研讨会。

郑教授早年进过牛棚，以后又因人诬陷而受整顿，经历坎坷。但是他仍然心志不减，潜心治学，慧心而巧思，精进而不休。郑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发表了《苏格拉底与司马迁比较论》，此文又在法兰西学院院刊全文转载，有了国际声誉，是国内难得的西方哲学专家。郑教授又被认为是巴尔扎克式的学者，在他身上迸发出来的光和热足以照亮古城大学的任意一个角落。在学生眼里，“郑教授在，哲学学院就在，古城大学就在。可以说，郑教授是古城大学学界的一面旗帜”。

然而，哲学家的翘楚也是肉体凡身。他由于太劳累，而又饮食不周，患有高血压、前列腺炎、便秘、直肠癌等疾病。郑教授知晓自己的病，但是他坦然面对猝

不及防的病变乃至死亡，并且开始对生死、何谓幸福这类问题进行必要的思考。他认为人的死亡都是既定的，无法避免。但他并不悲观，而以毛主席“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以及司马迁说过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勉励自己，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2012年春天，德高望重的著名哲学家郑嘉欣教授因病医治无效离开了他孜孜以求精心耕耘50年的哲学园地，离开了爱他敬他的学生们。郑教授是为他心仪的西方哲学，为他的信仰而累死的！

2012年秋天，郑教授的遗著《法国近代哲学在中国的传统与发展》付梓。次年该著作获政府大奖。这充分证明了郑教授生前专注于西方哲学的研究并且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佳绩。

小说书名为《郑教授的生死恋》是作者聪慧、幽默而又突现本真的措置。乍一看，还以为小小说是一部情感故事，读后方晓是写郑教授做学问目标专一，矢志不渝，呕心沥血，死而后已。哑然失笑间佩服作者不



郑教授的生死恋

俗之才智。小说作者的视野极其开阔，内容非常广泛。郑教授诸人一般在古城大学文学院、历史学院、哲学学院进行学术活动，就近涉及科技大学、咸阳民族学院，又远及北京燕山、西藏民族学院，更远及法国巴黎第八大学、巴黎郊区的贝尚松等。而且对方外异域的环境、位置、人情、景物都描写得细致逼真，历历在目。可见作者胸有乾坤，文章载物丰厚。

总之，《郑教授的生死恋》内容丰满，主题厚重，是高校教学、科研、人事关系的“大观园”。读者身处“大观园”里，时时感受到上扬的正气，闻听响亮的倡导教育改革的号角。